

后现代历史哲学中的“虚构”

王志华¹, 胡静丽²

(1. 江西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 江西 赣州 341000; 2. 南昌航空大学 科技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34)

摘要:在后现代历史哲学中,“虚构论”是非常时髦的。一方面,“虚构”是对机械真实观的否定,它赋予了历史学家极大的创作自由,这是其值得称道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它却把本真的历史“悬置”起来了,局限于在形式层面来谈虚构,这又让人难以接受。对于真实与虚构二者之间的关系,值得捍卫并且能够捍卫的理论立场应该是,真实是虚构的前提与基础,虚构是真实的升华,虚构与真实一体相依。

关键词:后现代历史哲学;海登·怀特;虚构;真实

中图分类号:B7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4)01-0129-05

一、“虚构论”的兴起

历史学与虚构原本是泾渭分明的。一直以来,人们普遍坚信,历史学以如实再现过去为其使命,绝不容虚构,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到现代的兰克,都恪守着这一原则。不过,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兴起,国内外不少学者开始质疑历史学与虚构之间的传统界限。于是,原本与历史学无甚关系的“虚构”这时候也成了历史哲学界谈论的一个焦点。

“虚构”是历史学形式化的产物,该议题的始作俑者当属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看看他的文献就容易发现这一点。怀特的代表作是发表于1973年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1978年的《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以及1987年的《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等,这些著作所表达的核心思想即历史叙事的意义根源于话语结构与修辞,他明确地指出,“因为任何写作一个叙事的人都是在进行虚构。我用了诗性、修辞性这样的词”^{[1](P33)}。“我将历史说成是事实的虚构化和过去实在的虚构化。”^{[2](《中译本前言》P7)} 依此逻辑,历史本身是无“形式”的,由此历史学家便可以自由地赋之以“形式”从而让历史具有意义,显然历史的意义就源

于该“形式”而不是历史本身。这样,历史叙事就是纯粹形式的产物,和历史本身无关。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常说的“历史”其实指的是“历史叙述”,历史叙事即历史,也就是说形式即历史;而形式是历史学家建构的,所以,历史即虚构。

怀特及其后继者之所以聚焦于历史学的“形式”,从深层原因看,这 and 传统历史学真实性范畴的机械化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前者正是对后者的否定。在历史学中,真实性的载体当然是历史事实,所以真实性指的是历史事实的真实性。传统历史学不仅致力于发现真实的历史事实,而且要在此基础上发现隐藏在历史事实背后的规律,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于是,在真实与规律二者的模糊辩证之中,衍生出这么一个理论怪胎,即认为历史事实之所以如此发生,乃历史规律所决定,历史不可能以其他方式发生,而只能如此发生,所谓“历史不容假设”,于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就等同于历史规律本身。所以,历史不仅是一系列前后相续的历史事实链,而且还是一个表现着历史必然性的链条。历史事实规律化导致历史的单一化,由此形成线性历史观,这严重地简化了历史的意义,因为这遮蔽了“可能的历史”:首先,它遮蔽了历史事实本身的“可能性”,因为它只承认其必然性,而否认其偶然性。其次,它不承认在该历史

收稿日期:2013-10-06

基金项目: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项目编号:13XZX001)

作者简介:王志华(1978-),男,江西赣州人,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历史哲学研究;胡静丽(1983-),女,江西吉安人,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场景中发生其他历史事实的“可能性”，而把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看成是唯一可能发生的情况；换言之，它把真实的历史等同于必然的历史，把“已经发生的”等同于“必然会发生的”，而实际上，“已然”不等于“必然”，因为“已然”中蕴含着“偶然”。所以，历史事实的规律化就把历史简单化了，极大地窄化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也极大地束缚了历史学家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从这个角度看，“虚构论”其实就是为了捍卫“可能历史”的合法性，并以此来释放历史学家的想象力，赋予历史学家以更大的创作自由与创作空间。如果说传统史学的目标是“发现”历史真实，那么后现代史学的目标则是“发明”历史形式，以富有启发性的新形式来形塑历史真实，以此展现历史的丰富意义，深化人们对历史对人性的理解。

二、“虚构论”的尴尬之处

“虚构论”的兴起，确实是为历史哲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把“历史学的形式”引进了历史哲学的学术殿堂。但是，目前对“虚构”的研究中，存在着某种尴尬之处，即他们一方面承认历史的真实性，诚如彭刚指出的，“大概后现代史学理论家中，没有人会认为历史与小说全然没有分别，就像没有人会否认存在着一个真实不妄的过去一样”^{[3](P77)}。而另一方面又大谈历史学的虚构，这两个立场之间总让人觉得很别扭，非常不协调。这一点在怀特本人的理论中体现很明显，如历史事件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留待下文讨论），一方面坚持历史学的虚构，另一方面又认为“真理问题无从回避，这是确定无疑的。因为那是确立起历史写作可能性的约定俗成的东西之一”^{[1](P28)}。

可以说，这种左右为难的尴尬处境在国内学术界也是普遍存在的。比如彭刚，他一方面认为，“虚构”（fiction）“并非纯然就是中文中的‘向壁虚构’、凭空想象的意思，而更多带有人为、创造、想象、建构的蕴涵”。这里显然肯定了历史学确实存在“虚构”；另一方面，他又坚称，“真实不妄的过去的存在（即便我们只能通过文本而对它有所领会和把握）、史料的束缚、史家技艺（如史料的考订、解释方法的恰当性）等等，就是史家所受到的限制”^{[3](P77,78)}。这里他肯定了历史的真实性。所以，他对怀特提出了质疑，“怀特理论中那种强调历史著作中‘被建构的’因素远远超出了‘被发现的’因素的倾向，难免会受到人们质疑”^{[4](P33)}。再如陈新，他说过，“当后现代主义

认为历史是一种虚构时，它并不是说无中生有，而是指历史叙述的形式结构往往是史学家诗性想象的产物”^{[5](P21)}。一方面“不是无中生有”，另一方面，“形式结构……是想象的产物”。把彭刚和陈新的相关论述结合起来看，就能够发现，他们的理论立场大体一致，即一方面肯定历史学中的虚构，另一方面又不否认历史的真实性。

可以说这些学者的观点非常具有辩证性，非常契合史学实践，其尴尬之处在于它容易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即历史真实性不重要了，或者说历史根本就无所谓真实，历史纯粹是历史学家想象的产物，这显然不是他们所能认可的立场。细细分析，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主要原因就在于“虚构论”自身理论有缺陷，如怀特在相关文献中指出，“在以‘事实的文学性’或者我所选定的‘事实再现的虚构’为话题的讨论中，我们感兴趣的是，历史学家的话语和虚构作家的话语在多大程度上是彼此重叠、相似或符合的。虽然历史学家和虚构论作家关心的是不同种类的事件，但他们各自话语的形式以及他们的写作目的常常是一样的”^{[6](P129)}。也就是说，怀特所关心的只是语言形式层面，而不关注语言形式与真实历史之间的关系，他回避了虚构与真实之间的关系，对真实性“存而不论”。这是虚构论的理论起点，但是他们并未对这一起点的合理性给出论证，这就是其理论盲点。由此他们建构起了“虚构”话语环境，在其中“真实性”的地位隐而不显。所以安克斯密特（F. R. Ankersmit）会抱怨：“怀特在《元史学》中提出的史学理论完全聚焦在史学文本层面上，也就是说，它没有给关于史学文本和它所言说的过去实在间的关系的分析留下任何余地。因而，它完全排除了对史学文本与过去间关系的认识论探讨的可能性。”^{[7](《中译本前言》P32)}因此，尽管如彭刚所言，没有任何后现代主义者会否认真实历史的存在，但在这种语境中仍极易给人造成那样的印象。

这样看来，“虚构论”是对机械真实观的否定，释放了历史学家的想象力，赋予了历史学家极大的创作自由，这是其值得称道的地方；但由此它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他们把本真的历史“悬置”起来了，把它们变成了康德意义上的“物自体”，局限于在形式层面来谈虚构，这又让人难以接受。为了消除“虚构论”的尴尬，就得追问在历史学中虚构与真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历史叙述确实是真实与虚构二者的结合体，但是，真实与虚构如何结合成有机的整体？具体而言，“虚构”的合理限度何在？真实性

在历史学家“虚构”的过程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是真实性依赖于虚构，还是虚构依赖于真实性？等等。只有在回答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才能够合乎逻辑地谈论历史学中的虚构。

三、“虚构”与“真实”的统一

通过以上论述，不难发现，虚构论尴尬的根源就在于他们回避、忽视了真实性这一话题，在其理论中，根本就没有真实性的存在空间。而且后现代主义者也承认历史的真实，既然如此，那么就该“拨乱反正”，重新把真实性这一范畴置于理论的思考之中，即要捍卫它在“虚构论”中的地位，辨析清楚其理论价值。本文认为，值得捍卫并且能够捍卫的理论立场应该是，真实是虚构的前提与基础，虚构是真实的升华，虚构与真实一体相依。如前所述，虚构论者都坚称虚构绝非无中生有向壁虚构，这其实就暗示捍卫真实性的理论地位是可能的，这就给了笔者以希望。

（一）虚构的类型

在论证这些观点之前，必须先谈谈虚构的类型。众所周知，安克斯密特把历史叙述划分成两个层面：一是历史事实层面，一是历史叙述的整体层面。与此相对应，本文认为，历史的虚构也有两种类型，即历史事实层面的虚构以及历史叙述整体层面的虚构，前者可以称之为“内容的虚构”，后者可以称之为“形式的虚构”。前者的例子，比如众所周知的，“1895年大清为慈禧筹办了60大寿庆典”这是真实的历史事实，那么，“假定1895年慈禧没有做大寿”并以此为前提，演绎出后来中日甲午战争的另一结局，这就是在虚构历史事实，是内容的虚构。另外，虚构历史细节也属于内容的虚构，叙事，其实就是讲故事，而讲故事涉及到诸多细节，这些细节绝大多数都是不可能被史料确证的。

形式虚构的例子，如同样是法国大革命，托克维尔把他写成一幕悲剧，米什莱则把它写成一幕喜剧，在此，内容都是一样的，不能够虚构，但再现的模式则是虚构的，即一个是悲剧模式，一个是喜剧模式。但无论是哪种虚构，在历史实在中都没有其对应物，所以本质上它们都属于语言的存在，是“语言物”^①。

有学者指出，“史书中的虚构，是为了补充事件发展过程中不足的链条，是历史学家重现历史、反映历史的重要手段，它追求的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小说的虚构想象，则是作者表达自己的审美理想的创作手法，它追求的是艺术的真实”^{〔8〕}（P194）。这里所讲的

两种真实，大致分别对应于内容与形式的虚构，即内容的虚构追求历史的真实，形式的虚构追求艺术的真实。

（二）真实是虚构的前提与基础

首先，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说真实是虚构的前提与基础。既然有两类虚构，那么我们得一一分析它们与真实性之间的关系。“内容的虚构”指的是这样的历史现象，即在过去的某个历史时期中，它们没有发生过，但是从现有史料看又没有办法排除其发生的可能性；所以很显然，“内容的虚构”展开的是可能的历史，而可能的历史之所以是可能的，其根据还在于历史的真实性即以历史事实为基础；或者如前文所言，已然发生的历史不等于必然的历史，在某个历史时期，历史发展的方向是多元的，在其中只有少数可能的历史会真实发生，但并不能因此而遮蔽那些没有发生的历史的意义，否则将会扼杀人类历史的丰富性，这样看来，“虚与假无涉。相对于已然、实然之实，虚只不过是未然但未必不然的可然性，属于潜在可能性的范畴。……虚不等于假，其中蕴涵着真与实，因此，在一定时机下它可以转化为实，正如一种可能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实现为现实性”^{〔9〕}（P15）。比如，“1895年慈禧60周岁”，这是真实的历史事实，以此为基点展开分析，在1895年大清国至少存在两种可能的历史走向：其一为慈禧筹办60大寿庆典；其二，不为慈禧筹办60大寿庆典。尽管前者在后来变成了真实的历史，但依据相关资料并无法排除后一种情况在当时发生的可能性，所以，历史其实是可以假设的，历史学家可以假设“1895年慈禧没有做大寿”，并由此演绎出中国后来的历史走向（当然这个演绎同样要以真实性为基础），这样可以丰富历史的意义，可以深化人们对历史乃至人本身的理解，是非常有意义的。

而在“形式的虚构”中，情况也大致相同，也就是形式与真实内容之间总得保持一种合理的关系，形式不是超脱的，而是要受制于内容，“只有这样才可能令其‘经验内容’最大化，才能给出关于经验实在之性质的有意义信息”^{〔10〕}（P97）。“形式”说到底其实就是作者对历史的理解与看法，或者说是“偏见”与“先见”。任何人都有偏见，偏见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真实充分依据的偏见，诚如解释学所指出的那样：“解释者无需丢弃他内心已有的前见解而直接地接触文本，而是只要明确地考察他内心所有的前见解的正当性，也就是说，考察其根源和有效性。”^{〔11〕}（P343~344）换言之，如果某个历史学家可以证明

自己偏见的合理性,让读者无缝可钻无话可说,那么这样的偏见就是合理的。在托克维尔眼中,法国大革命是一个悲剧,这就是托克维尔的偏见,但他依据真实的历史素材给出了充分的论证,确实是非常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从而成就了一部经典。而在米什莱的眼中,法国大革命是一个喜剧,这是米什莱的偏见,但是他的论证却经不起推敲。如早就有学者对米什莱不愿说明自己的资料来源而不满,并指出他过于依赖丰富的想象这一事实,也无怪乎在19世纪末随着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兴起,该著作便被时代抛弃了^[12]。因此,“几乎没有哪个历史学家怀疑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描述优于米什莱的”^{[10](P98)}。可见,怀特的这一观点——即“句子层面上史学与文学的指实与虚构之别在文本层次上是无效的”^{[9](P15)}——就显得非常粗糙,所以,真实性依然是判定历史叙述优劣的重要依据。

真实是虚构的前提与基础,可以据此来反思怀特的相关理论。怀特区分了“历史事件”与“历史事实”,“前者是实际发生过的孤立事件,后者则是经过作者筛选,并用一种虚构的制式(fictionalmatrix)或概念装置(conceptual apparatus)串联起来的叙事对象”^{[13](P6)}。怀特承认前者的客观真实性,而坚称后者的虚构性,他说:“我始终把‘事实’视为建构之物,……它是一种语言学上的或话语的虚构,即把它视为某种人工制成的或制作的东西。”^{[2](《中译本前言》P7)}所以,可以说,历史事件代表的是真实性,历史事实则代表虚构,所以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在怀特这里就体现为历史事件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

那么在怀特看来,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我们来看看历史事实的形成过程就可以发现其理论主旨。怀特说:“史学家通过将事件确定为充当故事要素的不同功能,将编年史中的事件编排到一种意义等级之中。”“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如果史学家赋予它一种悲剧的情节结构,他就按悲剧方式‘解释’故事;如果将故事建构成喜剧,他也就按另一种方式‘解释’故事了。”^{[13](P7,8)}这个说法告诉我们,历史事实的意义完全取决于历史学家的选择与安排,历史事件自身是无意义的,所以历史事实的意义就完全取决于历史学家本人,历史学家可以对历史事件、史料任意取舍从而建构各种类型的历史故事。从这个角度讲,历史事件只是历史创作的原始素材,当它被历史学家所选中并被编排到叙事结构之中时它就获得了意义,也由此历史事件就转变成了历史事实。

所以总起来看,怀特承认历史真实性,但却贬低

了它的地位,即在他的理论中,真实性是不重要的,史学成了纯粹的虚构,显然这既不符合史学实践,在理论论证上也存在缺陷,如怀特在面对“大屠杀”这一议题时,他又承认,“不仅事实是给定的,而且事件之间的关系、事件所构成的情节化模式、事件相互之间所蕴涵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给定的,……历史叙述、历史构图与历史实在之间的关联比之他所明确承认的要紧密得多”^{[4](P34)}。这表明,历史事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历史事件之间有其内在的联系,这类联系在历史学家建构历史事实的过程中非常重要,所以真实理应是历史学创作的基础。

(三)虚构是真实的升华

其次,虚构是真实的升华,意思是说,真实仅仅是历史创作的起点,远非其终点,历史学家应以真实为基础,而创作出隐喻意义最大化的作品,以此来深化人们对历史及人本身的理解,以此来照亮历史与现实。关于这一点,安克斯密特有非常经典的论述,他说:“叙事的‘视点’好比一个观景楼:在我们登上了所有通向楼顶的楼梯之后所看到的‘观点’的视域,比观景楼的楼梯本身要宽阔得多:在楼顶我们看到了一幅全景。叙事中的陈述好比我们获得一个‘视点’的工具,就像观景楼楼梯的台阶,但是,人们最终看到的东西却包含了比陈述本身所表达的多得多的实在。”^{[14](P223)}“观景楼”就好比历史叙述,建造“观景楼”的材料就好比代表真实性的历史陈述。显然,建造“观景楼”的目的是为了看风景,所看到的风景就是对“观景楼”的超越与升华。依此逻辑,构建历史叙述的目的是为了阐发出丰富的隐喻性意义,这个意义超越了该叙述所包含的所有陈述句子之和^②。无论是内容的虚构,还是形式的虚构,它们既寓于真实性又超越于真实性,是在真实性基础上的升华。

这个升华意义重大,它可以照亮过去,即“为叙事的范围所覆盖的那些过去之特定部分,被这些‘视点’所‘照亮’。这个视域越广,它就越多地超越叙述陈述的描述性意义,在叙述主义者看来,这样的叙事也就越成功”^{[14](P224)}。历史蕴含着丰富的意义,但它无法自我显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确实是晦暗不明的;它之所以变得有序明了,就是得益于历史学家的叙述活动。它也可以照亮现实与未来,因为政治活动和历史叙述活动具有类同性,历史著述可以成为现实政治活动的实验地,在此检验不同政治与伦理原则的优劣,比如“在以某种政治理念的名义发动革命之前,最好是先从对受这种理念激发的历史

著述的优劣尽可能准确与冷静的判断入手”^{[10](P99)}。这也就是说,最优秀的历史叙述所蕴涵的政治与道

德价值在实践中成功的概率相对更大,由此指导现实的政治决策也会相对少走弯路。

注 释:

- ① “语言物”和安克斯密特的“叙述物”(Narrative Substant(s))稍有区别,安氏恪守单个历史陈述与整体叙述之别,所以后者仅仅指历史叙述的整体层面,而前者则包括这两个层面,即整体的叙述是语言物,虚构的单个历史事实也是语言物。关于安氏叙述物的详细论述,请参见其著作“Narrative Logic: A Se-

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 p. 96—104.

- ② See Frank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 p. 59—62. 关于这一点的具体实例,见彭刚. 呵呵勋爵与历史文本的游戏,《读书》,2008年第7期。

参考文献:

- [1] (波兰)埃娃·多曼斯卡. 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M]. 彭刚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 (美)海登·怀特. 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M]. 陈新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3] 彭刚. 被漫画化的后现代史学[J]. 书城,2009(10).
[4] 彭刚. 叙事、虚构与历史——海登·怀特与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型[J]. 历史研究,2006(3).
[5] 陈新. 实践与后现代史学[J]. 学术研究,2004(4).
[6] (美)海登·怀特. 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M]. 董立河译.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
[7] (荷兰)F. R. 安克斯密特. 历史表现[M]. 周建漳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8] 林小云. 从历史叙事走向文学叙事——从史料的运用看《吴越春秋》的叙事特征[J]. 中州学刊,2009(3).
[9] 周建漳. 虚实与真假之间:由史学与文学的关系说起[J]. 学术

研究,2009(3).

- [10] F. R. Ankersmi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11]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M]. 洪汉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12] Jules Michelet,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M]. Translated by Charles Cocks, Gordon Wright(eds).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
[13] 林庆新. 历史叙事与修辞——海登·怀特的话语转义学[J]. 国外文学,2003(4).
[14] Frank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M].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83.

Fiction in the postmodern philosophy of history

WANG Zhi-hua¹, HU Jing-li²

(1. School of Chinese and Law, Jiang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anzhou, Jiangxi 341000, China;

2. Schoo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34,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fiction is popular in the postmodern philosophy of history. It is the negation of the mechanization theory of truth, and it gives freedom to historians for creation. Yet, it views fiction as just the form by suspending key issues of the real history. Truth is the foundation and premise of fiction, while fiction is real sublimation of truth. They are the two sides of a coin.

Key words: postmodern philosophy of history; Hayden White; fiction; truth

[责任编辑 许婉璞]